

蔣中正的東北經驗與九一八事變的應變作為——兼論所謂「銑電」及「蔣張會面說」

劉維開*

關於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應變政策的相關研究，大多偏重在政治層面的探討，從國民政府面臨變局時的內外形勢進行分析。但是從政治權力結構分析，當時掌握政策最後決定權者，是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

蔣中正對於國家大政方針多有其個人看法，在探討九一八事變後的應變問題上，尤其要注意蔣氏對於東北的瞭解。蔣中正是中國國民黨領導階層中，少數對東北問題有一定認識的人。他早年曾撰文探討東北問題，並曾於民國三年奉孫中山之命有一次為期二十餘天的東北之行，使他對東北問題有進一步的實地了解，對於東北問題自有其個人的體認。從蔣中正在九一八事變後發表的關於東北問題相關言論來看，他早年的東北經驗對於處理東北問題，特別是在如何應付日本侵略東北的問題上，實際上產生一定影響。筆者將從蔣中正的東北之行以及對東北問題的認識，來探討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處理態度。

同時，筆者在文中也對研究九一八事變所謂「不抵抗政策」時，兩個史料上的問題——民國20年8月16日的「銑電」及九一八事變前夕蔣中正與張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副教授。



學良在於石家莊會面的「蔣張會面說」進行探討。

關鍵字：蔣中正、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政策、張學良

一、前言

關於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應變政策的相關研究，大多偏重在政治層面的探討，從國民政府面臨巨變時的內外形勢進行分析，這個方向基本上沒有問題，筆者於數年前撰寫《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一書時，對於這個問題的探討，亦是如此。但是從政治權力結構分析，當時雖然是訓政時期，中國國民黨以黨領政，黨採用常務委員制集體領導，遇事共同決定，但是掌握最後決定權者，則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

蔣中正對於國家大政方針多有其個人看法，在探討九一八事變後的應變問題上，尤其需要注意蔣氏對於東北的瞭解。東北位於中國北方邊陲，革命時期距離南方革命中心頗遠，革命力量薄弱。民國2年（1913）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流亡到日本後，籌畫第三次革命，以日本距東北較近，十分重視東北地區的革命活動，曾派陳其美、戴傳賢等赴該地活動，但是相較於廣東及長江流域各省，與革命運動的關係確實較淺，因此在國民黨的領導階層中，對於東北有認識的人不多，蔣中正正是其中之一。

蔣中正與東北發生關係，得自陳其美的介紹。陳其美曾於民國3年（1914）1月奉孫中山指派與戴傳賢赴東北發展革命勢力，停留約兩個月，於3月中返回日本。蔣中正早年追隨陳其美，在這種關係下，蔣中正曾於民國3年有一次東北之行，使他有機會對東北問題進行實地了解，對於如何解決東北問題有其個人的意見。這項意見對於日後處理東北問題，特別是在如何應付日本侵略東北的問題上，應有一定影響。筆者將從蔣中正的東北經驗，來探討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處理態度。



二、蔣中正的東北之行

民國3年7月至8月間，蔣中正曾有二十餘日的東北之行，此行係受孫中山指派前往，主要目的在發展革命運動，策應軍隊，但無功而返。

緣於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陳其美等流亡日本，爲了發展反袁工作，陳其美向孫中山建議，在東北建立革命基地，得到孫的同意，於是與戴傳賢於民國3年1月，自東京經神戶赴大連。陳、戴在大連停留期間，一面受到北京政府警探的密查，一面又受到日本官廳的壓迫阻撓，工作環境相當惡劣，雖仍有若干進展，但與原先設想相差甚遠，於3月中返回東京。¹7月，陳其美接到東三省同志寧武報告，表示吉林、黑龍江兩省已運動成熟，黑龍江省巡防隊旅團長巴英額及獨立騎兵旅團長英順願意加入革命黨，請迅速派員前往主持。陳因事務繁忙，不便離開，於是推派蔣中正與丁景梁（人傑）隨同任職大連滿鐵公司的山田純三郎至哈爾濱、齊齊哈爾等處，先了解狀況。²蔣中正曾於事後回憶提及此事，謂：「（陳英士）當時接東省同志之報，有巴、英二統領者，請其速往主持，以在東事繁，不克速離，乃命中正與丁景梁至哈爾濱、齊齊哈爾等處，先往視察。」³丁景梁，名人傑，湖北人，曾入江西新軍，任司務長；武昌起義後，任鄂軍都督府參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曾爲稽勳局選派赴美留學，後因二次革命發生中止，參與討袁，失敗後赴日，居留東京，時往見孫中山，關係頗爲密切。

關於蔣中正東北之行的經過，他個人留下的資料並不完整。蔣中正在哈爾濱期間得歐戰消息，次日即上書孫中山陳述歐戰趨勢並倒袁計劃。該計劃書現存內容不全，大致可以了解蔣氏在文中分析歐洲局勢及與反袁的重要關

¹ 莫永明、范然：《陳英士紀年》（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10月），頁265—270。

² 同前，頁285。書中原書「接到東三省同志寧孟報告」，「寧孟」為「寧武」之誤，該書作者係將《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中「寧孟言告於黨曰」之「寧孟言」誤為「『寧孟』言告」。寧孟言即寧武，字夢岩，曾入同盟會，參與東北革命工作，民國以後，參加孫中山領導討袁，為東北方面主要負責人之一。

³ 蔣中正：〈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劃及事略〉，《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上集卷一，第25頁。



係，同時建議革命發展的計劃。文中亦簡略提到在東北的工作情形，謂：「巴某（按：巴英額）方面，確實之音耗未至，故猶竊冀其事之成也。再遲幾日，如其絕對無望，則介石等暫赴奉天，協助千山方面之動作，以期直搗賊巢之便捷，否則重返東瀛，另圖南方之大舉也。」⁴至民國34年（1945）11月14日，蔣氏在復員整軍會議上講話，談到東北問題時，對民國3年東北之行則有以下的陳述：

記得我在民國3年到東北去考察的時候，總理曾經對我說：「日本人如果不將東北和臺灣交還我們，並保證朝鮮的獨立，我們國民革命運動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將這個意思告訴日本將領。」那時候日本軍閥還意圖拉攏我們革命黨，我在日本人的掩護招待之下，在東北的滿洲里、哈爾濱、長春等地，住了三個月，最後在長春鐵道飯店日本軍人的招待會上，我將總理的意思表達出來，並說日本要協助中國革命，應該作列強的榜樣，首先作具體的表示。當時招待會的主持人是一位日本聯隊長，聽了我的話大為不滿，面紅耳赤而去，第二天就請我離開東北！⁵

不過，蔣氏在東北停留時間不到一個月，他說「住了三個月」，時間上應該有錯誤，至於所述是否事實，因為是回憶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不得而知。毛思誠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中對於此事的記載則較為詳細：

時有東省同志寧孟言告於黨曰：「吉、黑二省軍隊，運動已成熟。巴、英二統領，請派員迅往主持。」幹部信之。秋，總理與其美乃命公與丁景梁前去。及抵哈爾濱，視察革命程度與各地實況，因受中、日官府蹂躪，死氣沈沈，一時未易進行。乃知寧故為張皇，意在騙款。此事徒成幻夢。居月餘，適歐洲大戰突起，見中東路俄國動員甚緊張，

⁴ 〈上總理陳述歐戰趨勢並倒袁計畫書〉，民國3年，《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六別錄，頁4。千山方面應係指參加遼寧方面同志工作。

⁵ 〈整軍與建軍（下）〉，民國34年11月14日在復員整軍會議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一演講，頁183。

乃急遽回東京覆命，主另闢革命途徑。⁶

此外，東北方面革命運動領導人之一的寧武，在其手撰〈東北國民革命之回憶〉一文中，亦提及此事，謂：

民國3年黑龍江旅長巴凌雲，因其叔父遭袁世凱殺害，決意投效本黨。另一旅長英繼中□願與巴取一致行動。巴等稔知寧武係老黨人，密派人與寧通款，約期舉事。寧以茲事體大，不宜造次，乃親往東京報告孫先生。先生指由陳英士接洽處理，遂商定派今總裁蔣公及同志丁人傑與日人山田等，於是年7月間抵哈爾濱，曾約巴旅軍官一度會議於某東洋館。終以受歐戰影響，不及籌措巨額軍費，事□無□。⁷

可以補充蔣氏相關資料的不足。

日本方面，在外務省檔案中的警視廳監視記錄及駐外人員報告中，有較多的資料可以參考。根據警視廳送給外務省對於孫中山的監視記錄，顯示在蔣、丁、山田三人在7月6日出發前，曾多次面見孫先生：

7月2日下午一時，陳其美、王統一、蔣介石、山田純三郎四人來訪，議事。王一時三十分，山田、蔣二人一時四十分，陳三時四十分先後離去。

7月5日下午一時三十五分，丁仁杰、蔣介石來訪，面談，二時五十分離去。

7月6日下午六時，丁人杰來訪，面談，六時四十分離去。

7月6日下午六時五十分，蔣介石來訪，面談，七時五十分離去。⁸

所談內容，雖不得而知，但是亦可見孫先生對於此事的重視。

駐外人員報告方面，目前有三份日本駐東北外交人員致外務大臣加藤高明

⁶ 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一冊（民國26年3月印行），頁5—6。

⁷ 寧武：〈東北國民革命之回憶〉，《中國國民黨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重慶：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33年11月），頁136。□為字跡模糊，難以辨識。

⁸ 俞辛焯、王振鎖編譯：《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年8月—1916年4月）》（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頁165—167。

報告，對於此事有比較清楚的說明，可以參考。其中兩份是當時日本派駐哈爾濱代理總領事川越茂分別於7月24日及8月5日的報告，另一份是駐齊齊哈爾領事館事務代理吉原大藏於7月25日的報告。根據川越茂7月24日的報告，蔣中正、丁人傑（景梁）係化名日人，以上海滿鐵辦事處職員的名義，隨任職大連滿鐵公司礦業課的山田純三郎於7月6日自東京出發，經過朝鮮，於10日抵達哈爾濱，隨即派代表赴黑龍江省巴彥縣巴英額的駐地，遊說請其加入革命黨，計劃等代表說服巴英額後，山田再出面，與巴會談。川越茂推測孫中山方面預備利用北京政府計劃將黑龍江省防軍改編為新式陸軍所引發的不滿，策動巴英額、英順加入，謂：

今年4月間，北京政府打算將黑龍江省巡防隊改編成新式陸軍，為此紛擾屢起。儘管如此，當局前些時候仍然一意孤行，強行改編，結果巡防隊有多位士官及士兵因此而被淘汰（從五十一營緊縮為十八營）。這些人原本多半是現任旅團長巴英額及獨立騎兵旅團長英順的部下。由於將士們憤恨不平，以及巴、英兩旅團長基於同澤情誼，自然也會有所不滿。此外巴旅團長原本是馬賊出身，性情橫暴，使得革命黨人有機可趁。原計劃是先遊說巴英額，而後再遊說英順，企圖將其納入孫文陣營，待他日有事時，便可率領新舊部屬舉兵。⁹

山田派往巴英額方面的人於25日回到哈爾濱，是時山田在齊齊哈爾了解軍隊改編的情形，蔣、丁兩人也利用這段等待的時間到長春活動。

根據駐齊齊哈爾領事館事務代理吉原大藏的報告，山田於24日到達齊齊哈爾後，拜訪了巡按使兼參謀長姜登選及獨立騎兵旅旅長英順、師參謀長李景林等，但是只作了一般寒暄，於26日回哈爾濱。至於蔣中正與丁景梁在長春的活動，則沒有見到相關報告。日本駐長春代理領事酒匂秀一於9月1日對中國革命黨來往情況報告，曾表示長春與哈爾濱不同，「第二次革命騷擾以來，

⁹ 《關於滿鐵公司職員山田純三郎渡滿一事》，駐哈爾濱代理總領事川越茂呈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大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日本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革命黨關係》。此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黃自進先生提供譯稿。

可以視作革命黨員者之來往極少，而且無有計劃在本地舉事者，故此沒有特別值得注意之處。」¹⁰不過在這份報告中有「7月14日，有革命黨員寧夢岩來到本地後，即前往哈爾濱。」¹¹寧夢岩，即寧武，此時係前往哈爾濱與蔣、丁、山田三人會合。孫先生於是月20日為策動巴英額事，曾致函山田、丁、柳、寧、蔣諸同志，請轉致巴函及委任狀。¹²

至於巴英額方面的反應，根據川越茂8月5日的報告，巴英額在接到山田等傳達之訊息後，表示在齊齊哈爾的軍隊正有嚴重內鬨，不方便離開駐地到哈爾濱，同時也不方便讓山田到巴彥縣，因此派一心腹曲營長於7月27日至哈爾濱與蔣中正等交換意見。據山田透露給日公使館根津翻譯員的談話內容如下：

曲營長將孫文託當地使者交給巴旅團長的密函交還給山田。這次黑龍江省巡防隊改編的結果，巴英額、英順等雖然都升任為旅團長，但因為部下多半被裁汰，所以兩人的榮銜也只是一時的。等到此次裁汰兵解散後，應該還會進行第二次的裁汰，屆時兩人自忖將會被免職。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進而舉兵，參與孫文的計劃，南下攻擊袁軍。即使不幸全軍覆沒，至少也有「義舉」之名。為此，也派遣密使，赴吉林與該地同僚武官共商南下之大計。此外，巴、英旅團長同時也考慮將家人暫遷至大連。對巴、英兩人擬將家人暫遷大連之計畫，山田不置可否，只表示將利用任職滿鐵之便，保障其安全。至於吉林同僚武官方面的聯絡、舉兵，就需等待孫文的指示，此刻雙方會面首在確保巴旅團長有意舉兵而已。山田並表示，巴果真允諾舉兵的話，軍費的支出由孫文負責調度，在合適的時機就可以提交。曲營長說軍費的籌措

¹⁰ 〈有關第三次革命之黨員來往情況報告〉，俞辛焯、王振鎖編譯：《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年8月—1916年4月）》，頁656。

¹¹ 同上，頁657。

¹²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四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8年11月），頁317。柳指為柳大年，與寧武相同，亦為東北方面革命黨人。



是非常重要的，否則舉兵南下時，糧食的補給只得靠掠奪才行。至於軍費要如何籌措，非得由巴自己來哈爾濱與山田進行具體的協商，或是他自己與山田等前往東京，與孫文直接會商。曲營長於 28 日回到了巴彥州。

報告中表示，山田認為從巴英額的回應來看，這次的使命是達成目的了。但是等了幾天，都沒有接到巴英額進一步的消息，蔣中正曾經利用這段等待的期間再到長春。最後決定不再繼續等下去，於 8 月初離開東北，回到東京。而川越茂在報告中推測巴英額沒有進一步消息的原因，應與北京政府於 7 月份自上海匯入當地銀行黑龍江省政府帳戶的四十萬元軍隊解散費有關，「既然被裁汰的士兵有撫慰金暫時可資安撫，山田等人的使命自然極難實現」。¹³ 駐齊齊哈爾領事館事務代理吉原大藏亦認為黑省軍隊改編後，被解散的士兵雖然為數不少，但是並沒有出現不穩的狀況，而且當地抱有革命思想者很少。¹⁴ 可見寧武對巴英額及英順的活動確有其事，只是由於巴、英兩人首鼠兩端以及其他緣故而事終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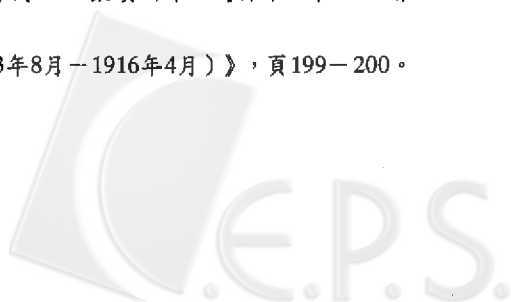
蔣中正、丁景梁與山田純三郎於 8 月中返抵東京，根據監視報告，8 月 16 日上午八時三十分，陳其美、王統一、山田純三郎與蔣中正赴孫中山寓所，談話約二小時，蔣與山田先行離去，陳、王於十一時二十分相繼離去。當晚七時五十分，蔣中正再至孫處，十一時二十分離去。¹⁵ 丁景梁則是於 18 日晚八時二十分，與田桐赴孫寓所談話，九時離去。¹⁶

¹³ 〈關於滿鐵公司職員山田純三郎渡滿一事〉，駐哈爾濱代理總領事川越茂呈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大正三年八月五日。此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黃自進先生提供譯稿。按：此電譯文亦見俞辛焯、王振鎖編譯：《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年8月—1916年4月）》（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頁674—676。

¹⁴ 〈關於滿鐵公司職員山田純三郎來齊之報告〉，俞辛焯、王振鎖編譯：《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年8月—1916年4月）》，頁673—674。

¹⁵ 俞辛焯、王振鎖編譯：《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年8月—1916年4月）》，頁199—200。

¹⁶ 同上，頁202。



三、蔣中正對東北問題的認識

蔣中正的東北之行雖然無功而返，但是他在實地考察東北形勢之後，對於東北的情況顯然有較為深刻的認識，而且這段經歷對於他在日後處理東北問題時也有相當影響。蔣中正於九一八事變後，曾經多次提及他在東北之行後上孫中山報告書中所表達對東北問題的觀察，說：「東北問題，非東北之單純問題，當留待東亞問題全部之解決」；¹⁷「東三省不是國民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國民革命最後目的地。因為東北問題，乃是一個關係整個國際局勢之東亞整個的問題，所以不是我們在革命發動之始所可能解決，而必須求之於國民革命目的達成之際，纔能得到根本解決」。¹⁸也就是說在蔣氏的認識中，東北問題有它的國際性與複雜性，不是單純的東北問題。

蔣中正對於東北問題的關注，並不是在到過東北之後才開始的。他於民國元年（1912）在《軍聲雜誌》撰寫〈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征蒙作戰芻議〉等文章，就已經觸及東北問題。在〈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一文中，他將西北的國防分為東北部之滿州、北部之蒙古和西部之西藏三部，對於東北的地位，特別指出：「東北部之滿州，雖非外藩，而要不能與本土同視，況滿族視為丘首，日本居為奇貨。」¹⁹這是蔣氏對於東北與中國本土關係的最初認知，語意雖然含蓄，但已將東北問題與蒙藏問題等同視為邊疆問題，並且明確指出日本對東北的企圖。他在文中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分為三個時期，以 1895 年締訂馬關條約以前為第一期，自馬關條約以至朴資茅斯條約為第二期，朴資茅斯條約之後為第三期，亦是侵奪東北利益時期，謂此一時期：「以朝鮮為其宗主權，且繼承俄國勢力，租借關東洲，延長各支線，開掘各炭礦，久占南樺太，由是而領安奉線，而爭間島，而奪警權，而吞韓國，

¹⁷ 〈十年來革命經過之回顧〉，民國 23 年 6 月 16 日發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二演講，頁 240。

¹⁸ 〈「九一八」十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民國 30 年 9 月 18 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一書告頁 269—270。

¹⁹ 〈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五文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 73 年 10 月出版），頁 25。

而築鴨綠江鐵橋，而占東北沿海漁利，舉凡種種不合公法之舉動，不一而足。」²⁰不過蔣中正在民國元年撰寫這幾篇文章時，並沒有到過東北，主要是依靠書面或傳聞的資料。當他到過東北，並且實地了解當地的情勢後，對東北問題當有深一層的看法，在邊疆問題的認識上自然有所調整，同時對於日後處理東北或邊疆問題亦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若干影響。

蔣中正於民國23年（1934）3月7日在南昌講〈中國之邊疆問題〉，認為各國解決邊疆問題之方法，不外兩種，一是剛性的實力之運用，一是柔性的政策之羈縻，如果國家實力充備，有能力顧及邊陲，當然可以採用第一種手段，一切皆不成問題；「但吾人今當革命時期，實力不夠，欲解決邊疆問題，只能講究政策，如有適當之政策，邊疆問題雖不能澈底解決亦可免其更加惡化；將來易於解決。否則，必將坐失時機，壞國家百年大計也」。²¹他以邊疆問題的國際性與複雜性，表示：「邊疆問題實到處牽涉外交問題，蓋談東北與內外蒙古，不離對日俄之外交，談新疆西藏不離對英俄之外交，談滇桂不離對英法之外交，故中國之邊疆各方面皆有問題，而每一方面又常常牽涉多角之外交關係，包含國內國外諸多複雜之問題」，批評政府的邊疆政策一面既不肯放鬆，一面又無實力顧及，「在此既不能收又不能放之情勢下，眼見邊疆多故，情形日益惡化而束手無策，甚至釀出許多大禍。」他並舉了兩個例子說明，一為日本要求承認東三省商租權為撤廢領事裁判權的交換條件；一為中東路事件發生後默許蘇俄勢力進入東北，謂：

民十九討逆戰事結束，日本見我革命勢力之發展惴惴不安，亟謀所以妥協相安之道，當時田中首相曾向我政府提議以撤廢在中國之領事裁判權為交換條件，請承認日本人在東三省之商租權，容許其內地雜居。方討論此項提議時，適內蒙有代表到京，請求政府阻止內部各省漢人至內蒙各旗開墾。結果政府一面不准內蒙代表所請，一面又拒絕

²⁰ 同上，頁28—29。

²¹ 〈中國之邊疆問題〉，民國23年3月7日在南昌北壇官邸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二演講，頁105。



日本之提議，當時一般人以為承認日本之商租權即為賣國，予當時則以為現在國力不充，東北事實上久在日本勢力支配之下，既有相當的交換條件，儘可以遷就事實承認其商租權之要求，以求東北領土之安全，不必斷然拒絕，仿佛內蒙各旗之固步自封。但一般人均料日本人無進佔東北之膽量，甚至主張寧肯待東北被佔，不可輕易承認其商租權，日本之提議，遂行擱置。時至今日，乃知當時之失策，予相信若英俄政府處此類情況，必承認日本之商租權也。此外更有關於東北問題之一事，亦為失策之一著，即當19年中俄戰爭發生後，予曾有電致張漢卿氏，主張退至長春以南默許蘇俄勢力南進，蓋蘇俄如進至哈爾濱以南，必與日本發生衝突，再進至長春以南則衝突必特別嚴重，吾人在實力不夠時，依此以造成在東三省兩強相防相制之均勢，即可於兩國利害衝突之中求東北較長時期的苟安，同時自己整理內部猛力建設以充實力量，庶幾有邊陲鞏固之一日。其時張以我說近乎理想（其代表王樹常之見地即如此），未能見諸實行，而張作相等新挫之餘，急於議和，隨即簽字停戰。惟蘇俄外交乃真有見識，彼在五年計劃未完成以前，絕對避免與任何國家尤其是日本發生衝突，故當時中俄戰役，俄人亦急於收束不敢南犯，然而最切實際而能生效之政策，中國方面又失之矣。²²

他認為處理邊疆問題應該要從環境與實力上作打算，決定一個明確政策。這個政策，他稱為「允許邊疆自治之放任政策」。他說：「國家大事，完全為一實際的力量問題，國際關係，乃純粹決於實際的利害打算，依此而籌邊，在今日情勢之下，雖不欲放任，事實上也只能放任。放任自治，則邊民樂於自由，習於傳統，猶有羈縻籠絡餘地，外強中乾，則諸族隔於感情，惑於大勢，絕無把握統治之可能。」他並以內蒙德王要求自治為例，表示：「如政府絕

²² 同上，頁105—108。商租權係指日人可在滿蒙從事商業及租賃土地，原本日人只能在旅順、大連及滿鐵附屬區從事商業活動。



對不許，彼逕自投降偽國，我將如何？」²³

以蔣氏當時在黨政軍方面所處的地位，為何會對政府的邊疆政策提出如此的強烈的批評，確實難以理解，但是如果從蔣氏早年對於邊疆問題的注意以及他的東北之行來看，不難找出其中的脈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演講中舉的兩個例子，都是他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時期的事，而且與日本在東北的勢力發展有關，一為日本在東北的利益擴張，一為日、俄在東北的爭逐，顯示他對東北問題有其個人的見解，同時凸顯了他在處理東北問題或邊疆問題時所面對的侷限性。

蔣中正在民國23年底以徐道鄰的名義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其中對於東北當局與國民政府的關係有一段十分明白的說明：

即就東北四省被佔為例，在中國國家喪失此重要之領土，當然為一極嚴重之損失，但以革命期內的國民政府的性質視之，一時的得喪幾無關係，且無寧謂塞翁失馬。蓋吾人曾聽到中國國民黨當局說：『收復東北，革命黨當然應負其責任，但失去東北，革命黨不負其責任。』作者不是國民黨黨員，對於此話，不欲斷言其是否為國民黨自圓其說。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²⁴

他亦曾經公開表示九一八事變有其特殊性質，謂：「吾人苟悉心研究東北之歷史與地位，更可認識東北事變有其特殊之性質」，指出「百年來之東北，本為帝國主義者角逐之場，其根深蒂固，久已構成一極複雜錯綜之關係，打破此種關係，斷非如17年之統一東北，一舉而得者之簡單而便易。東北問題，早成歷史上國際之問題。」²⁵所謂「悉心研究東北之歷史與地位」，實際上顯示出蔣中正觀察東北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對照前述中東路事件引進蘇俄勢力

²³ 同上。

²⁴ 〈敵乎？友乎？〉，《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四專著，中國之命運，附錄，頁144。

²⁵ 〈十年來革命經過之回顧〉，民國23年6月16日發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二演講，頁240。

的問題及德王要求自治兩事，他對於東北問題顯然有其現實的考量。一直到抗戰勝利，在接收東北的問題上，蔣氏亦表示：「寧可將東北問題暫時擱置，留待將來解決」，「先安關內，再圖關外」。²⁶雖然大環境有不同的考量，但是就他個人的主張而言，仍然不脫現實考量的思維模式。

四、九一八事變後的應變作為

正因為蔣中正對東北問題有其個人的理解，體認到日本在東北的現實，因此對於萬寶山事件的發生，警覺到處理此一問題的敏感性，稍有不慎即可能使日本在東北進行軍事侵略行動，所以於民國 20 年（1931）7 月 11 日致電張學良要求地方當局保持冷靜，小心應付，避免抗議行動過激，風潮擴大，並稱日人行事狡猾陰險，「此非對日作戰之時」。²⁷他亦曾根據財政部長宋子文、上海市長張群報告：「日人包藏禍心，正思乘隙以逞，而薛篤弼、陳友仁、劉紀文等，又在日活動，詭謀可知，現在各地反日援僑辦法，實有審慎將事之必要，若中央地方黨政各界，步驟不能一致，勢必授人以柄，徒益糾紛，況反動之徒，惟恐不亂，難保不混跡各地，鼓煽風潮，發生意外」等情，電囑中央轉令各級黨部特別注意，「如有不軌行動，應即取締，以免為反動派所利用，藉安人心而防意外」。中國國民黨中央乃於 8 月 3 日電令各級黨部，務須遵照中央頒佈之對日運動方式，勸告商界自動抵制，其有故意惹事，行動不軌者，須立即懲處。並稱：「總之，吾人對於日人之橫暴，須以堅忍不拔之決心，群作徹底之

²⁶ 〈剿匪戰術之研究與高級將領應有之認識〉，民國 34 年 11 月 16 日在重慶軍事委員會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一演講，頁 189。

²⁷ 參見鹿錫俊：《中國國民政府之對日政策，1931—1933》（東京：財團法人東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 月 30 日），頁 35。「此非對日作戰之時」一語，引自梁敬鐸：《九一八事變史述》（紐約：聖若望大學亞洲學院，民國 53 年 11 月），頁 117。此電梁書中僅引電文中最後一句。易顯石等著：《九一八事變》（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 年 2 月）亦有同一時期蔣中正致張學良電：「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時，恐被共產黨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時對於中日紛爭，更有導入一層紛亂之虞。故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頁 185）應與日方資料為同一電，因日方所保存電報係由中文轉譯，恐有語意上誤差。

奮鬥，黨政密切合作，以免意外之發生，庶足以杜帝國主義者及反動份子連合之陰謀，俾外交得達最後之勝利。」²⁸但是「此非對日作戰之時」並非完全不抵抗，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與九一八事變畢竟不同，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後，直接做出不抵抗的指示，這個指示與蔣中正在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時所做的指示，是否能併為一談，有商榷的必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立法院副院長邵元冲得知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方面採的不抵抗時，記道：「（日軍）佔領瀋陽之時，華軍均絕無抵抗，聽憑繳械，據張漢卿來電，稱為不抵抗主義。其實所謂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開火攻擊，並非武裝軍人遇敵來襲擊至包圍繳械時，猶可束手交械而謂之為不抵抗主義者。民族主義、國民精神喪失已盡，安怪異族之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²⁹戴傳賢、朱培德亦表示：「政府只有始終宣示和平，從國際上做工夫，然當時當地軍隊，若竟無一舍死之人，恐外無以啓世界對中國之信賴，內無以立後代兒孫之榜樣。」³⁰邵、戴與蔣氏私誼甚篤，朱為參謀總長，如果蔣氏確有「不抵抗政策」之決定，三人為何會有此表示？對照張學良在其晚年回憶，一再強調「不抵抗」的命令是他下的，絕非中央的命令。³¹一個合理的解釋，應該是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的不抵抗行動確實出乎蔣中正以及南京方面的意料之外。

²⁸ 總統府機要室輯：《「瀋陽事變」編案紀要初稿》，頁4。

²⁹ 邵元冲：《邵元冲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頁774—775。

³⁰ 〈戴傳賢朱培德呈蔣主席九月寄電〉，《革命文獻—瀋陽事變》，《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³¹ 最近公開的張學良與唐德剛談話記錄中，兩人對於「不抵抗」命令的下達，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張將軍對唐教授說：「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裡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那麼，唐教授就問張將軍：「漢公，你為什麼要下不抵抗的命令？」……「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唐教授笑著感慨道。……「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詢地問。「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但你要說我不抵抗，我是一點不服的。」參見王書君：《張學良世紀傳奇》（16）、（18），《多維週刊》總第83期，www.chinesenewsweek.com。

就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應變措施來看，蔣中正除了一再要求張學良不得與日方進行直接交涉，外交上必須聽命中央外，基本上十分尊重張學良的作為。從防守錦州、熱河等問題上，即可看出蔣的態度。但是蔣中正對於他所能掌控的長江下游地區進行了軍事布署。

9月22日，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請示：「淞滬為通商巨埠，日艦駐泊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各機關施行威脅或襲擊時，我陸海軍究採取何行動。」蔣中正復以：「應正當防範，如日軍越規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³²9月23日，蔣中正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並且考慮備戰計劃，決定以西北為政府第二根據地，以洛陽或西安為陪都；手擬對日開戰時的宣言要旨，要求各國元首應共負公約上之責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³³10月初，有日艦大舉至上海，且有即日在華界上陸消息，蔣中正於六日指示上海市長張群：「日本軍隊如果至華界挑釁，我軍警應預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³⁴是日舉行特種外交委員會，針對日艦出沒一事，決議：「日本海軍出動情形，如係為恫嚇中國政府及示威之企圖，無論提出任何條件，我政府決不為其屈服，在此原則之下，一切應付辦法，請主席隨時處辦。」³⁵出席會議的邵元冲在當日日記中亦記道：「關於日本近日派軍艦來長江示威之應付，決定令淞滬軍警長官嚴加防禦，必要時取自衛行動。又對於日軍侵犯首都時，亦決定堅持不屈，以相抵抗。」³⁶對於蔣中正的指示，或特種外交委員會的決議，有人認為只是紙上作業，並非真實作為，但就當時在京、滬一帶人士確實感受到政府的軍事應變作為，吳忠信記道：「近

³²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9月），頁285—286。

³³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頁132、136—137。

³⁴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頁290—291。

³⁵ 劉維開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1年6月），頁26—27。

³⁶ 邵元冲：《邵元冲日記》，頁781。



日謠言甚多，有日軍威脅長江之說，南京已備戰，人民紛紛遷移，真正內憂外患也。」³⁷

綜合而言，蔣中正於民國3年的東北之行，對於他在東北問題的認識上產生一定的影響，認為東北問題有其國際性、複雜性，特別是日本在東北的勢力，有其個人的體認。而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東北問題亦是邊疆問題的一部份，蔣中正對於邊疆問題所提出的「允許邊疆自治的放任政策」，質言之，仍是著眼於邊疆問題的國際性、複雜性。從此一觀點觀察蔣中正對於東北當局處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所作指示，不難理解何以會提示「此非對日作戰之時」，至於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政策是否為蔣氏所下命令，或受蔣氏要求不與日方發生衝突之影響而作之決定，實非探討此一問題的重點。基本上蔣氏知道東北問題的複雜性，在東北問題的處理上十分尊重張學良的意見，張氏對於東北事務有主導權。九一八事變後的處理方式亦復如此，中央所決定者為外交方面，至於軍事的抵抗、不抵抗，張氏應是主要的決定者。對於日本軍事侵略一事，從蔣中正在其所掌控長江中下游地區進行的布置，以及對於日本要進攻上海，或者戰事擴及關內時的計劃，實可以了解蔣中正所採取的態度絕非「不抵抗」。

五、關於不抵抗政策的兩個問題

天津南開大學俞辛焯教授曾於九一八事變六十週年時，撰文表示考察「不抵抗主義」這個問題，應該注意「甄別史料，盡量引用當時的第一手原始檔案」，謂：「大陸史學界在此方面條件較差，大量引用文史資料中的回憶錄。這些回憶是珍貴的，但因時間的流逝，難免遺忘或者記錯，或是寫回憶時受環境的影響，因此，在使用時一定要注意仔細甄別。在臺灣方面。雖然保存有關史料，但因歷史的動蕩，未能保存足以研究此問題的史料，尤其是張學良的材料更是如此。而且編印的史料集是選編的，不是將檔案庫中一切材料都原原本本編入的。這些都成了實事求是地研究此問題的不利因素。因

³⁷ 《吳忠信日記》，民國20年10月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影印件。



此，今後應繼續發掘有關的原始檔案，這是研究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³⁸經過了十年，臺灣方面，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首度公布特種外交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中與處理九一八事變善後問題有關的速記錄，彙整出版《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並將塵封二十餘年，由中日外交研究會編印的《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九冊，重新發行；國史館則將原稱《大溪檔案》的《蔣中正總統檔案》開放，提供研究者參閱。但是大陸方面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遼寧大學焦潤明教授在2001年第三期《近代史研究》，發表〈80年代以來的張學良研究〉一文中，對於張學良「是否忠實地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這個問題的研究，表示大陸學者有兩種對立的觀點，而且都運用了大量史料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他說：

一種是強調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忠實地執行了蔣的不抵抗政策；另一種則強調張的執行蔣之不抵抗政策，不過是由於上下級關係不得不執行，以及受蔣的蒙蔽糊裡糊塗地執行。爭論雙方都運用了大量史料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主張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是忠實地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觀點的學者指出，7月發生「萬寶山事件」後，蔣介石反對反日運動，命令「隱忍自重」，張學良復電同意。8月發生「中村事件」後，蔣介石的鈹電（8月16日）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遵照執行。」張學良9月6日轉電臧式毅、榮臻：「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張學良又於同日致電張作相：「特急。吉督署張督辦：奉密電令：我國遵守非戰公約，不准釁自我開。特令遵照。張學良。」9月19日上午，張學良在講話中說：「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此外，9月24日張學良致蔣介石、王正廷電和1935年8月張學良在漢口某次宴會上之講話，都表明張學良的

³⁸ 俞辛焯：〈九一八事變時期的張學良和蔣介石〉，《抗日戰爭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雜誌社），1991年第一期，頁45。



確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平心而論，爭論雙方對於這一點並無分歧。但相比較而言，持相反觀點的學者則更強調「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對於日軍尋釁事件，蔣介石即已下達了不准抵抗的禁令。9月12日，蔣介石與張學良在石家莊會晤，蔣要張嚴令東北軍，凡遇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提交國聯和平解決。事變發生後，9月19日夜11時，蔣介石在南昌親筆起草了給張學良的加急電報。9月23日蔣介石發布的《國民政府告全國民眾書》中說：「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³⁹

事實上，不論那一個觀點，都涉及了「甄別史料」的問題，一是蔣中正的「銑電」，一是蔣與張於9月12日在石家莊的會晤，先談所謂「銑電」的問題。

「銑」為16日之代電韻目，「銑電」係指蔣中正於20年8月16日致張學良電。該電最初見於大陸方面出版《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所載洪鈞〈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一文，稱：

（九一八當晚）瀋陽有長途電話前來，甚為緊急。張學良立即返回協和醫院，接通榮臻的電話，據榮報告，「駐瀋陽南滿站的日本聯隊，突於本晚十時許，襲擊我北大營，誣稱我方炸毀其柳河溝鐵路路軌，現已向省城進攻，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電』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蔣介石於8月16日，曾有一「銑電」致張學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這個「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守）。張學良令其將續得情況隨時報告，但此後瀋陽電話即呼叫不通。⁴⁰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洪鈞擔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隨同

³⁹ 焦潤明：〈80年代以來的張學良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3期，頁265—266。

⁴⁰ 大風編：《張學良的東北歲月》（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11月），頁241。

張學良在北平辦公，對研究者而言，其回憶所提供資料自然有其權威性，因此大陸方面多數學者論及不抵抗政策時，均引用其所錄「銑電」，但是似乎沒有其他相關人士的資料可以印證是否真有此電。即使就部份大陸學者認為張學良受「銑電」影響，於9月6日致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關於不抵抗的電文，亦沒有提到與所謂「銑電」有關的字樣。⁴¹此外，臧式毅於1951年7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書寫交代材料，關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應變，亦僅書：「會同總司令部留守參謀長榮臻急電北京，向張學良總司令報告並請示應付方策。奉命是採取不抵抗主義。」⁴²同樣沒有蔣氏事前指示張學良不抵抗等相關記載。

可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洪鈞的回憶十分具體，應該有其依據，不過到目前為止，沒有見到關於「銑電」的原始檔案。就目前大陸方面出版的幾本相關檔案館編輯的九一八事變的史料選輯，⁴³除了吉林省檔案館編：《九·一八事變》外，都沒有收錄此電，而吉林省檔案館則註明該電係「館藏檔案資料」，而非「館藏檔案」，其格式亦不同於其他正式電文，似為轉錄洪鈞回憶或報刊登載資料，謂：「蔣介石以東北中日外交問題日趨嚴重，是日致電張學良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⁴⁴顯然在大陸的相關檔案館度藏資料中，應該沒有「銑電」的原始檔案存在。

臺灣方面，國史館度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中，亦不見此則電報。《蔣

⁴¹ 〈張學良致臧式毅等電〉，吉林省檔案館編：《九·一八事變》，頁172。電文：「遼寧政委會臧代主席、邊署榮參謀長鑒：平密。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即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⁴² 〈臧式毅筆供〉，中央檔案館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官員自述》（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頁70。

⁴³ 包括：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九·一八事變》，遼寧省檔案館編：《『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吉林省檔案館編：《九·一八事變》，以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等。

⁴⁴ 吉林省檔案館編：《九·一八事變》，頁172。

中正總統檔案》是目前最豐富、完整的蔣中正先生檔案。筆者曾查閱該檔案中的《革命文獻》、《籌筆》等部份，均沒有見到20年8月16日給張學良的電報。另據《事略稿本》所載，8月前半個月，蔣氏均在南昌督師，16日因其岳母宋太夫人將在上海舉行葬禮，需親往執紼盡禮，於當日從南昌至九江，預備乘船，是日記事：「由南昌搭車到九江，於車中閱長春市政籌備處調查萬寶山事件之報告。(中略)公閱畢，長嘆不已。曰：『一面交涉，一面侵襲，假交涉之談判，為侵襲之掩護，其詐欺殘酷之手段乃人類所未有之醜技。此其一步一步螺旋而進之侵略，吾已見其肺肝矣。嗚呼！天下從此多事，吾甚為民眾痛惜焉！』」⁴⁵次日，乘船回京，隨即乘火車赴上海，參加其岳母宋太夫人的葬儀。亦無關於「銑電」之記載。

因此就「銑電」而言，除了洪鈞的回憶外，包括其他相關人士的回憶、檔案館度藏的檔案及蔣中正個人資料等，幾乎沒有其他資料證實此電的存在，而洪鈞的回憶是否正確，則是一個疑問，在這種情況下，「銑電」是否能作為蔣中正主張「不抵抗政策」的重要史料，顯然是需要仔細考慮的。

另一個與研究不抵抗政策有關的資料，是蔣中正與張學良於9月12日在石家莊會晤的問題。9月12日與18日，只隔了六天，在時間上較「銑電」更接近事變的發生，有部份大陸學者在討論不抵抗政策時，即根據這些事實，指陳「張學良對於蔣介石上述不准抵抗的指示，是積極貫徹執行的，並及時向東北軍各部的長官，轉去蔣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⁴⁶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甚至還在展覽廳內以臘像方式佈置了「蔣張會面」的場景，宣稱這段歷史「通過仿真場景來表現，使觀眾們如身臨其境，『親眼目睹』蔣介石置日寇之侵犯而不顧，卻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⁴⁷

關於張學良與蔣中正在9月12日會面一事，是根據何柱國的回憶而來。《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六輯，登載何柱國〈九一八瀋陽事變前後〉一文中

⁴⁵ 《蔣公事略稿本》，20年8月16日，國史館藏。

⁴⁶ 李新、陳鐵健主編：《抗日潮流的起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頁85。

⁴⁷ 見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網站<http://www.918museum.org.cn>中關於展場介紹。

謂：

張學良於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蔣介石的密電，叫他於12日去石家莊與蔣會晤。那天上午，蔣、張分乘兩輛專車，蔣介石的專車自漢口開來，張學良的專車從北平開來，就這樣兩個人都未下車，把兩輛專車合攏後，在車廂裡舉行了秘密會談。那時我正駐防在石家莊，得訊後提早在車站外圍派部隊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專車及車站範圍內，則均由蔣、張自帶的衛隊負責。會談後，張學良親自告訴我，蔣介石對他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可以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那時就分辯不清了。」過了一星期，九一八事變果然爆發了。張學良下的一道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來源和真相就是這樣，而張卻替蔣介石背上了一個「不抵抗將軍」的惡名。⁴⁸

何柱國在另篇〈憶張學良將軍〉中，亦有類似的記述。⁴⁹之後，張友坤、錢進

⁴⁸ 何柱國：〈九一八瀋陽事變前後〉，大風編：《張學良的東北歲月》（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11月），頁231。

⁴⁹ 何柱國：〈憶張學良將軍〉，大風編：《張學良的東北歲月》（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11月），頁20—21。謂：「九一八事變以前，9月12日蔣介石曾電約張學良到石家莊進行了一次會面。這時我駐軍石家莊，鐵路外圍的警戒都由我負責。張、蔣兩人的專車到站時，兩人專車並停在一處，張即走上蔣的專車，車上除錢大鈞及蔣的衛士外，什麼人也不准上去。兩人談了一個多小時，張回到自己的車上，蔣的專車即開走了。我上車問張學良和蔣談了些什麼。張說：『不得了，日本人要動手了！』我說：『那我們得趕快調兵作好準備。』張說：『總司令叫我們不要還手。』我說：『軍人守土有責，敵人打來了，怎麼可以不還手呢？』他說：『是呀！守土有責，應該抵抗，但總司令說如果我們還手，在國際上就講不清了；我們不還手，讓他打，在「國際聯盟」好說話。』這就是不抵抗之由來。在蔣介石之授意與命令下，不戰而喪失東北，使張學良背上了『不抵抗將軍』之惡名。從這次石家莊蔣、張之秘密會見，也說明日本要佔領東北，蔣介石是事先得到情報的，我可以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

主編《張學良年譜》，將此事載入20年9月12日記事，雖未註明出處，但檢視文字內容，明顯依據何柱國的回憶。⁵⁰

何柱國稱9月12日蔣、張會面時，蔣的專車「自漢口開來」，但是根據《中華民國大事記》8、9月記事，蔣中正於8月28日到武漢視察水災，9月1日發出「弭亂救災」通電，二日離漢返南京，此後至12日，未有再度赴漢的記載。⁵¹就此點而言，何柱國的回憶顯然有錯誤。

其次，就何柱國所稱12日會面一節，亦非事實。9月12日當日，蔣中正整日在南京活動，並未有至石家莊的行程。據《事略稿本》12日記事，：「上午，與夫人等至天保城浙軍紀念塔野餐。下午，吳忠信持粵方汪兆銘等復電。」另據吳忠信日記12日所記：「偕三先生乘十一時三十分車，下午四時三十分到南京，六時在陵園晤介石兄，伊詢余主張，余切實進言，蔣意召集在京要人會議，余決在京小住。」⁵²次日，吳忠信再度會晤蔣中正「商京粵和平，擬發電粵中當局，請推代表二人來滬，與介石面談。」⁵³另一方面，張學良在12日亦有接見新任駐日公使蔣作賓的活動，據《蔣作賓日記》9月12日記：「晚六時與副司令接洽，方知日方亟欲分離吾國外交政策也。」⁵⁴因此蔣中正如果到石家莊與張學良見面，僅有午餐後至六時前約五、六小時的空檔，可以行動。不過以吳忠信由上海至南京的火車行程尚需五小時，五、六小時是否足夠能來回南京與石家莊，值得懷疑。所以就蔣中正及張學良在9月12日當日的活動來看，幾乎不可能有時間見面，而在引用何柱國的回憶時自然需加注意，更不應據此來說明蔣中正與張學良在不抵抗政策上的關係，甚至製造所謂「歷史場景」，從事宣傳工作。

歷史研究應該「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就「不抵抗政策」而言，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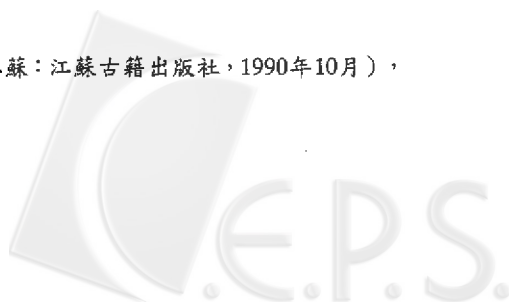
⁵⁰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573—574。

⁵¹ 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三冊，頁229—234。

⁵² 《吳忠信日記》，20年9月12日，黨史館藏影印件。

⁵³ 同上，20年9月13日。

⁵⁴ 北京師範大學、上海市檔案館編：《蔣作賓日記》（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頁356。



一政策對日後情勢影響甚大，研究者在史料的探求上，自然需要十分謹慎，特別是回憶性的文章，在應用時必須注意。就8月16日的「銑電」及9月12日的「蔣張會面說」而言，一是無法由原始文件及其他相關資料查證電文之真確性，一係透過《蔣中正總統檔案》及其他相關史料證明顯然有誤，在討論相關問題時，實在不宜一再被引用，以免誤導研究方向。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主辦「九一八事變與近代中日關係——九一八事變七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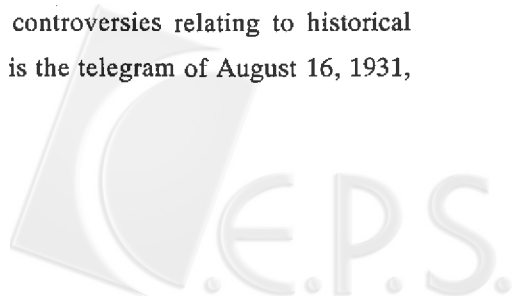
Chiang Kai-shek's Experiences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His Reactions to the Mukden Incident : with Discussions of the "Telegram of August 16, 1931" and the "Meeting of Chiang Kai-shek and Chang Hsueh-liang at Shihchiachuang"

Liu, Wei-kai

So far the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responses to the Mukden Incident of 1931 have mainly focused on political aspects by analyzing the changing sit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challeng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f we make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however, we will know that Chiang Kai-shek,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the man who took responsibility of making final decisions at that time.

Chiang's decision-making of national policies resulted mostly from his personal views. When we study Chiang's reactions to the Mukden Incident, we mus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is understandings of Northeastern China. Chiang was among the Kuomintang leaders who knew a lot about Northeastern China. He not only wrote something about Northeastern China, but visited there for more than twenty days in 1914 by order of Sun Yat-sen. This field trip did help him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Northeastern China and formulate his own conceptions. Judging from his remarks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we can find that his earlier experiences in Northeastern China had some effects on his reactions to the problems of Northeastern China, especially on his managemen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how Chiang's trip to Northeastern China in 1914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at area influenced his dealing with the Mukden Incident.

In addition, my paper will also examine two controversies relat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o-called "non-resistance policy": one is the telegram of August 16, 1931,



the other is about Chiang's meeting with Chang Hsueh-liang at Shihchiachuang shortly before the Mukden Incident.

Keywords: Chiang Kai-shek、Mukden Incident、non-resistance policy、Chang Hsueh-liang



